

《i-城志・我城 05》的 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

——兼論“後九七香港青年 作家”的情感結構*

鄒文律

提 要

西西《我城》面世 30 年後，潘國靈和謝曉虹以《我城 05》寫出了一部新世紀的“i 城”故事。小說通過再現發達資本主義香港的城市生活，寄寓了兩位作家對城市和身體空間的思考。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通過細析《我城 05》，探討潘國靈和謝曉虹在書寫“i 城”時，如何呈現香港那深受資本形塑的城市空間，揭示香港在 21 世紀初成為發達資本主義都市後的諸種空間特質。資本主義不僅按其邏輯塑造城市空間，身體空間亦在其支配之下，故第二部分聚焦於考察《我城 05》中的“勞動身體”和“疾病身體”。潘、謝二人一方面批判資本主義通過教育把“勞動身體”物化，另一方面亦指出“疾病身體”蘊含對資本主義的強大反思性/批判性力量。最後，本文把《我城 05》與韓麗珠、李維怡、可洛等

* 本論文為 Thei Seed Grant: “Reshaping My City: A Research on Hong Kong’s Young Writers Rewriting”（計劃編號：1516113）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謝研究助理林凱敏小姐協助搜集研究資料。本文初稿最先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首次宣讀於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疾病誌：中國現當代文學與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後來修改稿於 2017 年 6 月 21 日在由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杜克大學、台灣中研院共同主辦的“文本、媒介與跨文化協商：華文與比較文學協會雙年會”上宣讀，及後亦於 2017 年 6 月 24 日於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同代人的文化體驗——華語青年作家批評家國際研討會”上宣讀部分內容。承蒙與會學者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銘謝。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作品並讀,勾勒出他們的“情感結構”——抗拒資本在城市空間的無止境擴張。

關鍵詞：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 城市及身體空間 資本主義 情感結構

一、前言

誕生於 1970 年代的《我城》(1975)是西西的首部長篇小說,¹對後來的香港文學影響深遠。陳潔儀指出,《我城》開創了以香港一地為寫作對象的創作傳統,幾可運用拉丁美洲“立根小說”(foundational fiction)的概念來評價。²自《我城》問世以來,一批以香港為書寫對象/想象起點的小說漸次湧現,例如董啟章的“V 城系列”³、潘國靈的短篇小說集《傷城記》(1998)、梁偉洛的《鯨魚之城》(2009)、謝曉虹及韓麗珠合著的《雙城辭典》(2012)等。這些小說以“城”為名,既盛載了作家對當代城市生活和本質的探討,亦為作家對不同年代“我城”的文學記錄。

2005 年,即《我城》面世 30 年後,香港藝術中心發起了“i-city Festival 2005”創作項目,通過小說、繪畫、動畫和劇場的形式來對《我城》致意,亦展現了不同媒介的創作人眼中的“我/i 城”,力圖表現我城的混雜特色。⁴在這個創作項目中,

1 《我城》自 1975 年開始於香港《快報》連載,共連載了 150 天。結集版共有四個版本,分別為素葉版(1979)、允晨版(1989)、素葉增訂本(1996)和洪範版(1999)。見何福仁:《談談〈我城〉的幾個版本》,收於西西:《我城》(臺北:洪範書店,1999 年),1 版,頁 261—264。

2 陳潔儀:《香港小說與個人記憶》(香港:天地圖書,2010 年),1 版,頁 62—63。

3 “V 城系列”共由四部小說組成:《地圖集》(1997)、《V 城繁勝錄》(1998,2012 年再版時易名為《繁勝錄》)、《Catalog》(1999,2011 年再版時易名為《夢華錄》)、《博物誌》(2012)。

4 《i-城志》編輯小組:《有關〈i 城志〉》,收於《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及 kubrick,2005 年),1 版,頁 1—3。

潘國靈和謝曉虹負責“小說的 i 城”，⁵ 各自寫出兩個版本的《我城 05》。⁶ 《我城 05》沿用《我城》的人物，譜寫出幾位主角在 21 世紀“i 城”生活的故事。⁷

潘國靈《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由 18 個小節和 4 個悠悠撰寫的小說片段組合而成，描繪了大學生阿果、中學生阿髮、踏入社會不久的麥快樂和喜愛寫小說的悠悠的日常生活，著墨於 21 世紀初資本如何塑造香港城市的空間，以及棲居其中的青年人的所見所感。謝曉虹《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聚焦於已經投身社會的阿果身上，講述 i 城在毫無徵兆下受到一場“分裂症”侵襲——患者會裂變成兩個擁有相同樣貌和 DNA 的人，性格亦產生劇變。藉著敘寫患上“分裂症”的阿果、時常逃學的悠悠在 i 城的成長經驗，謝曉虹試圖批判資本對 i 城和個體的操控。

現存對《我城 05》的評論主要集中在《我城 05》和《我城》在選材上的差異，以及小說對 21 世紀初香港城市生活經驗的描繪，還有小說中對香港社會政治不同程度的回應。⁸ 評論未有觸及的是，香港具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城市特質，

-
- 5 潘國靈，著有小說《靜人活物》、《傷城記》；散文集《愛琉璃》；詩集《無有紀年》等。文學創作之外，作者亦撰寫城市及文化評論，著有《城市學》、《城市學 2》等評論集。潘國靈曾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並獲多個香港文學獎項，包括青年文學獎小說高級組冠軍、香港文學雙年獎小說推薦獎等，2011 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年度最佳藝術家獎（文學藝術）”。謝曉虹，現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好黑》，與韓麗珠合著《雙城辭典》，曾獲第十五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等多個文學獎項。
 - 6 這兩篇中篇小說分別是潘國靈：《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及謝曉虹：《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
 - 7 為了以小說創作來呼應“i-city Festival 2005”，潘、謝二人在小說中均以“i 城”來指稱“我城”。本文認為“i”，即英語中“我”的意思。潘、謝二人之所以運用小寫的“i”，大抵是要強調筆下的“i 城”乃出於一己對香港的觀察和想象。
 - 8 張歷君指出潘、謝二人雖然在筆調和文學形式選擇上各有不同，却同樣以小說回應了香港在主權移交後極具標誌性的政治事件，旨在表達作家對社會政治的思考，有別於《我城》對社會和政治討論點到即止的處理手法。見張歷君：《否定的希望——〈我城 05〉初探》，收於《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176—180。小土則從“起居”（Habitat）、“工作”（Occupation）、“母語”（Mother-tongue）和“事件”（Event）四方面來探討西西、潘國靈和謝曉虹筆下的城市生活有何異同，試圖比較三位作家對“家”（H-O-M-E）的看法。見小土：《再讀〈我城〉——論西西、潘國靈、謝曉虹〈我城〉中的生活想象》，《字花》，2016 年第 60 期（1—2 月），頁 124—128。張清秀析論潘國靈的《我城 05》時，指這部小說反映了香港在主權移交以後種種的社會問題。見張清秀：《那些年，那些事——潘國靈筆下的都市記憶》，《文學評論》，2012 年第 19 期，頁 117—118。三篇評論篇幅不長，未見觸及本文論旨。

如何投影為“i 城”的城市空間？如果“i 城”不免是發達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的文學形象，潘、謝二人對持續受資本形塑的“i 城”，特別是她的城市空間和棲居其中的身體空間，又有怎樣的思考？面對香港由資本推動的城市發展時，兩代作家在小說裏又寄寓了哪些感受？如果我們把《我城 05》與其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並置閱讀的話，能夠讀出此一文學世代對後九七香港懷有的共同情感嗎？本文試圖通過細讀《我城 05》和一批“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結合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空間論述，以及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s），析論上述問題。

二、受資本主義支配的城市空間 ——i 城的城市空間本質

潘國靈筆下的“i 城”在維多利亞港岸上矗立著十八幢高廈，⁹ 於璀璨煙花中顯出壯麗的色彩。¹⁰ 即使部分高廈的名字並非實際存在（如獅子銀行總行），但指涉實存大廈的用心昭然若揭（匯豐總行大廈門前擺放了一對銅獅子，可見獅子銀行總行實有所指）。這些高廈標明了香港是跨國企業總公司的所在地，也是資本集中和流通之處。潘國靈和謝曉虹的寫作風格縱然不同，但二人筆下的文字城市“i 城”，¹¹ 同時顯出深受資本主義支配的城市空間特色。以下將

9 這十八幢高廈包括：竹銀大廈（中銀大廈）、中環廣場、嘉誠集團中心（長江集團中心）、夏慤司令大廈（夏慤大廈）、i 城大會堂（香港大會堂）、i 城會議展覽中心（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獅子銀行總行（匯豐總行大廈）、渣甸大廈（康樂大廈）、花旗萬通大廈（萬國寶通中心）、交易廣場第一座、交易廣場第二座、國際金融中心一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水兵道政府合署（金鐘道政府合署）、炳湘地產中心（新鴻基中心）、中環中心、祖國人民解放軍駐 i 城部隊大廈（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大廈）、i 城演藝學院（香港演藝學院）。見《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23。括號為本文所加，當中的建築物乃其現實所指。

10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23。

11 貝頓·派克（Burton Pike）把城市分為真實城市（real city）和文字城市兩個層次。真實城市作為一種實然存在，由外部世界（outside world）的種種人造物品（artifact）構築而成，再折射為光譜（spectrum）進入作家的意識。文字城市相對真實城市而存在於文學作品中，是作家意識的文字顯影。Burton Pik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IX.

從三方面展開論述，展示《我城 05》對“i 城”城市空間的想象。

(一) 雙元城市 (Dual City)——i 城內的城市空間區隔

謝曉虹筆下的 i 城有兩個涇渭分明的區域，分別是 C 區和 M 區。C 區被巨型的玻璃幕牆建築物包圍；“很多人認為，i 城的繁榮全賴它們，因此，這些建築物一直是 i 城人引以自豪的象徵。”¹²這些矗立 C 區，叫 i 城人引以自豪的巨型建築物，謝曉虹雖未曾明言它們的名字，讀者也不難聯想到維多利亞港岸上的高廈（包括潘國靈提及的那十八幢高廈）。維多利亞港兩岸素來是 i 城的商業中心區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大型銀行、法律事務所、跨國企業總公司或地區總部棲身於頂級商辦大樓中，堪稱 i 城資本主義的心臟。C 區的“道路筆直”，¹³暗示這兒講究速度和效率（點與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必然是直線），務求令資本的流通毫無障礙。哈維指出，“資本主義就是成長”，¹⁴而“積累 (accumulation) 是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長的引擎”。¹⁵為了積累更多的資本，“這些建築物裏總是瀰漫著一種令人狂熱的氣氛，走進去的人都會像上了發條似的，瘋狂地工作，直至幾乎失去知覺”。¹⁶根據瑞銀集團所做的 2006 年《價格與收入》調查報告，香港人每年工作 2 231 小時，時數位居當年全球第二。¹⁷i 城人以長時間的勞動維持資本主義引擎的高速運轉，造就 i 城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

至於 M 區，“街道就像胡亂堆疊在一起的、僵死的竹節蟲，都把它們細長的、曲折的腿一直伸延至骯髒而狹窄的小巷。”¹⁸曲折而交錯堆疊的街道顯示這

12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74。

13 同上。

14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王志弘，王明民合譯：《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頁 180。

15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著：《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頁 346。

16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74。

17 Andreas Hofer (ed., Simone Hofer), *Prices and Earnings: A Comparison of Purchasing Power around the Globe* (Zurich: UBS AG, Wealth Management Research, 2006), p. 30.

18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70。

是一個雜亂而無序的空間，一個“巨型垃圾房似的區域”，¹⁹可見它和 C 區有天淵之別。M 區指向 i 城的邊緣(marginal)地區，“一個被領導者遺忘的區域”。²⁰

C 區與 M 區，構成了 i 城的中心與邊緣；前者光鮮亮麗，後者骯髒不堪。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組合起一幅“雙元城市”的圖像。佐迪·博爾哈(Jordi Borja)和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指出，幾乎每個國家的大都會都出現了嚴重的空間區隔，富裕階層和低下階層處身於大都會的不同空間，彼此毫無連結，有時甚至無法看見雙方的生活。²¹謝曉虹正是要以小說突顯內在於 i 城的空間區隔以及伴隨而來的生活方式區隔——小說描述阿果在 C 區工作和生活了幾年，幾乎忘記那個他和母親秀秀、妹妹阿髮曾經一起居住的 M 區。²²這個被阿果逐漸淡忘的 M 區，那兒的人要不是被“另一種生活方式”拋棄，則是自願拋棄“另一種生活方式”。²³無論出於自願或非自願，M 區的人顯然無法(或不願)採納“另一種生活方式”。所謂“另一種生活方式”應是指高度配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生活，一種屬於 C 區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見，C 區與 M 區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區隔(生活在 C 區的人一般不會進入 M 區，反之亦然)，其生活方式亦反映了沒有交雜的兩個社會階層。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提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當阿果偶爾想起阿髮和秀秀時，她們都是作為囤積在家裏的舊物出現的”。²⁴當阿果在 C 區開展自己的新生活時，留在 M 區的母親和妹妹只能夠以“舊物”的姿態“偶爾”出現在記憶中。謝曉虹在此要告訴讀者的是，血緣關係亦無法克服雙元結構造成的社會階層和空間區隔。

¹⁹ 同上。

²⁰ 同上。

²¹ Jordi Borja and Manuel Castells, *Local and Global: The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1997), pp. 38—44.

²²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70。

²³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70。

²⁴ 同上，頁 71。

(二) 城市空間商品化

城市空間在奉行資本主義的 i 城,不再僅僅是人類棲身、活動的場所,還在私有化的過程中變成商品投入市場。潘國靈在《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提及世上有 7 座凱旋門,²⁵而 i 城則迎來了世界第 8 座“凱旋門”。這座“凱旋門”高 231 米,比世界上其餘的凱旋門都要高。誠如小說所言,凱旋門在歷史上皆是為了紀念國王出征勝利而歸。²⁶在沒有國王的 i 城,這座“凱旋門”又紀念了什麼?“凱旋門”是香港新鴻基地產公司發展的豪華住宅項目,其拱門式建築意念來自法國巴黎凱旋門。小說提及的“凱旋門”是 2005 年開始預售的分層住宅物業,它的頂層特色單位曾經創出亞洲最貴分層單位的紀錄(每平方英尺逾港幣 3 萬元)。小說於此插入了一段對西西《浮城誌異》的評述:“一個作家說,浮城每年風季,城裏的人都會集體做夢,做一個相同的浮人的夢。”《浮城誌異·驟雨》提到浮城人每年風季都會做一個浮人的夢,夢見自己浮在半空。²⁷在《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敘述者認為西西沒有明確解說的這個夢,便是“凱旋門”夢——“沒有天空是不可接觸的,夢境中浮人站在半空中,就是為了親吻鑲了鑽石的天際綫。”²⁸如果浮城人集體的夢在 1980 年代的浮城(香港)尚未形成明確的內涵,潘國靈則認為在 21 世紀的 i 城,夢境已有明確所指:每一個 i 城人都想擁有自己的“凱旋門”。哈維指出,空間在資本主義城市化的過程中演變成可供買賣的商品,而金錢價值則成為衡量空間的唯一標尺。²⁹i 城人夢想擁有“凱旋門”並非因為那是讓人夢寐以求的居住空間,而是“凱旋門”作為商品所代表的金錢價值。當“凱旋門”占據了 i 城人集體的夢,不啻意味着資本主義在 i 城的全面勝利凱旋。城市空間於 i 城人而言,其作為商品的意義,已經遠

²⁵ 這 7 座凱旋門分別是:法國巴黎凱旋門、德國柏林凱旋門、意大利羅馬凱旋門、意大利米蘭凱旋門、朝鮮平壤凱旋門,還有意大利羅馬兩根分別紀念特拉亞諾皇帝遠征多瑙河和安東尼皇帝遠征不列顛獲勝的凱旋柱。見《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頁 59。

²⁶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59。

²⁷ 西西:《浮城誌異》,載西西:《手卷》(臺北:洪範書店,1988 年),1 版,頁 4。

²⁸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 59。

²⁹ Davi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 Blackwell, 1989), p. 177.

超其作為基本生活和活動場所的功能。

(三) “家”消費空間化

資本主義除了把城市空間商品化,還會把城市空間再生產為促進消費的空間,以支持資本的不斷積累和增長。《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中,麥快樂在 i 城芒角行人徒步區負責推銷流動電話月費計劃。芒角乃旺角的舊稱,小說還提到兆萬商場和潮流特區這兩個實際存在於旺角的商場,³⁰足見芒角乃旺角的投影。小說描述麥快樂“每天被色彩斑斕的招牌簇擁,被大大小小的屏幕包圍”。³¹芒角和旺角一樣,招牌和電子屏幕林立,內容全部是各式廣告,推銷林林總總的商品。行人走在其中,無時無刻被廣告鼓勵和教導去消費。不獨旺角如此,²¹世紀的香港,城市各處皆被資本再生產為消費空間。“行街是 i 城獨有的方言。雖說行街,大型商場才是平日城市人愛行的‘街’,在這些‘街’上,一個個亮麗櫥窗向你招手。”³²“街”的含義本來豐富多彩——它是城市的公共空間,各種社會事件發生的場所;既是連接城市人工作和居住場所的通道,也是“漫遊者”(Flâneur)觀察和理解城市的地方。然而,i 城人喜歡的“街”只是大型商場一類的消費空間。“街”的含意被消費主義完全占據,城市空間被資本塑造為有助其積累的消費空間。

城市空間再生產為消費空間不單改變了 i 城的營造環境,還一點一滴地改變了 i 城人的生活感受。麥快樂在芒角行人徒步區工作之初,每天被大量廣告簇擁,“回到家中會頭痛,睡覺會做異夢”。³³消費空間內的色彩刺激令麥快樂精神緊張而頭痛,睡眠質量亦大受影響。麥快樂的不適象徵了身體對於廣告宣傳的抵抗,但這種抵抗很快便消失,隨之而來是“慣性”(familiarity)的建立。

昂希·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指出“慣性”令人以為自己對周遭一切皆

³⁰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50。

³¹ 同上。

³²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24。

³³ 同上,頁 50。

相當了解和認識，令人把現存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從此失去對生活的批判和反思。³⁴ 麥快樂的身心浸淫在五光十色的消費空間(芒角)3個月後，他的身體不單再沒有不適感，回家後反而覺得“一片黑沉沉”。³⁵ 芒角的消費空間徹底變易了麥快樂原先對“家”的意識：“街頭成了室內居所，廣告是牆紙，大屏幕是電視機，影音店是唱機，茶餐廳是書桌。他漸漸明白，人，其實是一頭習慣的動物。只要習慣了，沒有什麼不可以的。”³⁶

“家”本來是城市人的居住場所，個人私密生活的空間。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指出，家屋為人抵禦天上和人生的風暴，讓生命在家屋的安適空間中展開。³⁷ 換言之，“家”提供了個體生命安頓和舒展的空間，抵禦外部世界的侵擾。然而，i城的消費主義已經全面侵入城市的每一寸空間——當麥快樂的“家”在意識中逐漸被芒角的街頭空間同化後，“家”被再生產成另一個消費空間。

“慣性”把麥快樂的“家”再生產為消費空間，秀秀(阿果和阿髮的母親)則主動把“家”設計為消費空間。退休後秀秀把家庭主婦當成一份新工作，努力搜購不同類型的食物和飲品供兒女享用：

買飲品她會買蘆薈汁雞骨草夏桑菊柚子蜜低脂無糖芝麻豆漿麥精豆漿，當然少不了阿髮喜歡的汽水，正宗可樂外還有雲呢拿可樂免咖啡因可樂青檸可樂。買薯片會買香辣味燒烤味紫菜味黑椒味韓國泡菜味香芥沙律味。吃甜品會試杏仁味豆腐花芒果味豆腐花綠茶味豆腐花原味薑汁撞奶阿華田薑汁撞奶杏仁薑汁撞奶。月餅除了單黃雙黃三黃之外，還會買雞油蛋黃朱古力五仁果子紫芋黑芝麻豆沙奶黃金華火腿雲呢拿冰皮士多啤梨冰皮。旋轉木馬道1號梅麗大廈18樓C座成了一間

34 Henri Lefebvre (trans., John Moo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pp. 14—15.

35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50。

36 同上。

37 加斯東·巴謝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68—69。

頂級超市。³⁸

羅拔·巴卡克(Robert Bocoock)指出,“消費主義——這種強大的意識形態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購買東西和成品的經驗——在現代資本主義中無孔不入”。³⁹ 秀秀把購買食物和飲品變成了生活的全部,甚至把自己的“家”改造成提供多種多樣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費空間:“頂級超市”。小說刻意鋪陳秀秀搜購回來的各種口味食物和飲品,既顯示 i 城的超級市場提供的商品種類繁多(同一種商品有多種口味),亦在文字編排上模仿了商品在超級市場貨架的排列方式(同類商品往往排列在貨架上的同一行)。值得注意的是,當商品排列在超級市場貨架時,消費者出於“慣性”,只會感到選擇繁多。然而,當商品以名詞的方式在小說密密麻麻地堆疊成長句時,則營造了一種叫讀者透不過氣的閱讀效果,產生使人眼花繚亂的視覺印象。當消費主義通過“慣性”讓人忘掉它對城市人生活的操控,潘國靈則通過文學的陌生化效果來消解“慣性”,重新令讀者感受 i 城消費空間為人帶來的壓迫感。

秀秀對兒女表現愛的方式,便是為兒女購買種類繁多的食物和飲品,讓他們有豐足的飲食供應。可是,當秀秀問阿髮喜歡什麼時,阿髮坦言太多選擇令她感到頭痛;秀秀請阿果在不同口味的薑汁撞奶中選擇時,阿果則因為選擇之間差別太少而不懂回應,只說了一句:“求其吧。”⁴⁰ 阿髮和阿果非但沒有為秀秀提供的眾多選擇感到欣喜,反而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這種無所適從並非僅僅來自過多的飲食選擇,還在於原屬私密生活空間的“家”,被秀秀改造為消費空間後引起的不適。

從前文分析可見,潘國靈和謝曉虹對資本在城市空間的無限擴張實在難有好感,其批判亦相當自覺。至於寫成於 1970 年代的《我城》,西西則傾向以一種輕鬆愉快的筆調來描述資本對城市空間的改造。《我城》描述阿果到郊外

38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35。

39 羅拔·巴卡克(Robert Bocoock)著;張君玫,黃鵬仁譯:《消費》(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 年),頁 80。

40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35—36。粵語“求其”即“隨便”之意。

安裝電話柱時，將之形容為“在郊外種電話柱”；阿果對工作的感覺則“像種樹”，而他也喜歡這些在郊外的新生樹木。⁴¹“我們不破壞，我們建設”——《我城》以積極的口吻來形容“我城”的基礎建設工程，視資本的空間擴張為建設“我城”的舉措，大抵與 1970 年代的香港城市發展有關——那時的香港尚未受發達資本主義全面操控；雙元城市、城市空間商品化，以及“家”的消費空間化等現象未算普遍。除此之外，《我城》洋溢的輕鬆愉快之情，亦與西西想要告別冷漠陰暗、寫一個符合自己個性，色彩豐富的小說不無關係。⁴²職是之故，當我們把《我城 05》和《我城》並置閱讀，不難發現兩代作家對資本塑造城市空間一事，展現了不盡相同的感受。

三、發達資本主義下的身體空間

關於空間和身體的關係，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指出，身體是個地方(place)，乃個人的區位和位址，而身體因其物質性，必然占用空間，並定位於空間之中。⁴³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亦提及，身體除了是生理空間外，還是一個受社會文化所建構的“個人空間”(personal space)。⁴⁴身體既然是空間的其中一種形式，那麼處於發達資本主義城市中的身體，即免不了受資本所塑造。《我城 05》除了關注資本如何營建 i 城的城市空間外，亦以阿果和阿髮的經歷，展現了資本主義怎樣在 i 城按其邏輯來塑造個人的身體空間。

41 西西：《我城》（臺北：洪範書店，1999 年），1 版，頁 207—208。

42 西西在自言寫作《我城》時，“那時候，我已把沙特、加繆、貝克特和阿倫·羅布——格里葉的書本放下，總覺得他們像傑可梅蒂的雕塑，冷漠而陰暗。這種調子和我的個性不合。我一直喜愛瑪蒂斯、米羅和夏迦爾那些畫家。讀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仿佛世界上又充滿了繁花和果園”。見西西：《序》，收於西西：《我城（增訂本）》（香港：素葉出版社，1996 年），1 版，頁 i。

43 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國立編譯館主譯；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頁 48—56。

44 Neil Smith, “Homeless / global: Scaling places,” in Jon Bird, ed.,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102.

(一) 勞動身體

哈維認為,身體雖然有一些與生俱來的特質(生物遺傳學上)不能被取消,但身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歷史和地理的可塑性,集多重社會生態過程於一身。身體如果要維持其存在,必須與環境進行交流,並不斷轉化自身來適應環境。⁴⁵ 身體既然處於資本主義構築而成的環境中,想要存活,則無可避免需要配合資本的生產、積累和運作模式,成為“勞動身體”(working body)。⁴⁶ 資本對於“勞動身體”的塑造,在謝曉虹《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裏,有相當自覺的探討。

在 i 城的中心區 C 區,謝曉虹以充滿象徵性的筆觸描繪了在該區工作的“勞動身體”:

走上了天橋,阿果們把相機的腳架置好。他們知道,只要在那裏稍稍等待,便會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從那些建築物裏湧出來。在他們拍下來的照片裏可以看到,那些人穿著一式一樣的襯衣,脖子都在緊束的領帶裏,艱難地伸展出來。如果把照片局部放大,便會看見數不清的,面相模糊的臉,以及無數複印出來似的表情。⁴⁷

在 C 區工作的人“穿著一式一樣的襯衣”,意味著這些“勞動身體”全部服膺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脖子都在緊束的領帶裏,艱難地伸展出來”則暗示了他們能應付高強度的長時間勞動,即使感到窒息亦會支撐下去。可見 C 區的人之所以面目模糊而表情一致,缺乏獨立的面貌,全因為他們不過是被動員到資本所規定的特定目標中的身體,他們就像勞動工具一樣,其作為生產力以外的面向並不受到重視。

令人扼腕的是,i 城人非但不抗拒這種生活方式,反而朝思暮想到 C 區工

45 David Harvey, *Space of H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98—99.

46 Ibid, p. 103.

47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74。

作。i 城人習慣讚美那些在 C 區工作的人，認為 i 城的繁榮全繫於 C 區。⁴⁸ 在 C 區工作的人被視為城市精英，對 i 城的繁榮有重大貢獻。

那麼，i 城人是怎樣被塑造成能夠充分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勞動身體”？小說提及阿果憶起少年時代的學校生活，以及他怎樣成為學校模範生：

他想，其實，要當模範生並不困難，只要掌握其中的竅門便可以了。在阿果就讀的那所學校裏，他們並不要求他過多地思考，只要服從他們，並把各種事情重複演練純熟，這樣，他便可以得到各種各樣的獎品。最初只是各種獎狀、橡皮擦；後來，當他進入 C 區後，便是汽車手錶房子。⁴⁹

與其說謝曉虹在此勾勒了一條在 i 城成為模範生和 C 區城市精英的路，倒不如說謝曉虹點出了資本主義如何通過激勵機制（最先在學校，後來在社會）來塑造有用的“勞動身體”。哈維論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能力”和“可能性”兩方面，致力於推動“勞動身體”的極限：

一方面，資本需要受過教育的、靈活的勞動者，但另一方面，它又拒絕認為勞動者應該能夠獨立思考。雖然勞動者的教育看起來很重要，但它却不能是那類允許自由思想的教育。資本需要某些種類的技巧，但憎恨任何種類的壟斷技巧。雖然一隻“受過訓練的大猩猩”足以勝任一些工作，但其他一些工作仍然需要創造性的、負責任的工人。雖然對權威的服從和尊重（有時是卑微的屈從）是極為重要的，但勞動過程的“塑形之火”（form-giving fire）所必需的創造性激情、自發的反應和活力同樣必須被釋放、被動員。⁵⁰

48 同上。

49 同上，頁 75。

50 大衛·哈維著；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99—100。

謝曉虹正好點出了資本對“勞動身體”的這種矛盾要求。資本一方面要求“勞動身體”受過教育,能夠靈活地勝任各種生產工作(學生需要把各種日後有助促進生產的知識和技能演練純熟);另一方面,又拒絕認為“勞動身體”應該能夠獨立思考(學校不要求學生過多地思考)。“勞動身體”需要有“創造性激情、自發的反應和活力”,但必須服從權威(服從學校的師長)。爲了處理資本對“勞動身體”的這種矛盾,資本主義需要某種規訓性監視手段、懲罰和意識形態控制,⁵¹令人不會抗拒資本的塑形。謝曉虹在《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告訴讀者,學校在資本主義中發揮了規訓與意識形態控制的功能。

與模範生阿果不同,阿髮(阿果的妹妹)是反叛學生,住在由“骯髒而狹窄的小巷”構成,“巨型垃圾房似的”M 區。⁵²正如前文所述,M 區的人的生活方式無法配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阿髮亦不例外。阿髮經常逃學到街上,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每次逃學被抓後,都會被“他們”(師長)罰站在黑板前,遭反覆追問畢業後的去向。當阿髮告訴“他們”自己喜歡繪畫,“他們”則只是關心阿髮是否想成爲畫家。阿髮坦言並非想成爲畫家,她只是喜歡“把一件物件,改換成另外一個模樣”。及後,阿髮更表示自己可能會陸續喜歡潛水、編毛衣、做蛋糕等。當“他們”聽到阿髮的答案後便皺起眉頭,開始悠長的訓話,告訴阿髮應該從現在開始計劃自己想要擁有的東西,包含房子、汽車、職位等,並列明一個時間表來爭取它們。⁵³

阿髮嚮往一種個性能自由舒展的生活。但當她的個性不能契合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時,學校便通過規訓和懲罰(師長不滿的表情和悠長的訓話)來改造她。即使阿髮追求的“勞動”(把一件物件改換成另外一個模樣)對她而言充滿創意,只要不符資本規定的特定目標,她便不算一個合格的“勞動身體”,需要接受改造。這種改造,絕對不會顧及個體的感受和意願。

潘國靈《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亦留意到教育把年輕人培育爲資本主義需

51 David Harvey, *Space of Hope*, p. 105.

52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70。

53 同上,頁 101。

要的“勞動身體”。在這個版本裏，阿髮即將參加香港中學會考。⁵⁴ 小說的敘述者以“物化”的方式把溫習中的阿髮形容為電腦：

阿髮的 RAM 不支負荷。怎樣也是 64M。只要關機睡了一覺，所有臨時記憶又 reformat，打回原形。所以，最近阿髮有點害怕睡覺。總想在睡眠前趕緊將 RAM 的記憶掃入永久記憶。但阿髮的永久記憶容量也不夠大，只有 10G。

溫書溫到 memory overflow。Battery low。頭痛。母親秀秀提神的方法是喝濃郁咖啡。阿髮不喜歡喝咖啡，咖啡因一進入大腦 CPU，就眼光光不能關機。⁵⁵

小說以儲存各種臨時資料的電腦記憶體（RAM）來形容阿髮的短期記憶；以硬碟的記憶容量（10G）形容阿髮的永久記憶容量；以中央處理器（CPU）來形容阿髮的大腦；把大腦記憶過程寫成電腦儲存資料的過程，顯然是把阿髮“物化”為電腦。這種“物化”不僅見於敘述者對阿髮的描述，更見於阿髮對自己的形容。當阿髮思考自己是否喜歡了網友 qwerty（qwerty 是一種標準電腦鍵盤布局）時，她把二人的關係比喻為蘋果和 IBM（兩家電腦生產商），又認為“自己的心，是沒有 space 再 partition 出來的了。想著想著，阿髮覺得自己 hang 機了。”⁵⁶ 無論是把內心的空間視為可以分割的電腦硬碟空間，⁵⁷ 還是把思維反應不暢順說成是“hang 機”（電腦死機沒有反應），這裏都可見出一種“自我物化”的表現。

阿髮“自我物化”為電腦一事值得讀者注意。踏入 21 世紀後，企業不論規模大小，都在生產上大量使用電腦，藉此提高生產力。電腦成為重要的生產資本。與人類不同，電腦只要接駁電源，基本上可以 24 小時不停工作，不需要通

54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 1978 年開始舉辦香港中學會考，乃香港極具規模的公開考試。大部分學生在完成五年中學教育後，均會應考中學會考，憑其成績用作升學或求職。

55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43。

56 同上，頁 46。

57 電腦硬碟可以分割（partition）成不同的儲存區域。

過休息和閒暇生活來恢復精力。隨著家用電腦日漸普及,居家就業越發普遍。個人即使在下班或休假期間,仍然能夠通過互聯網,以家用電腦來處理工作。阿髮“自我物化”為電腦一事提醒讀者,為了適應發達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勞動身體”必須面對上班與下班之間的界綫日益模糊之事實:“勞動身體”在下班時間仿如待機狀態的電腦,隨時可以投入生產。

為了應付會考,阿髮把自己“物化”為電腦。這樣的情節告訴讀者,資本主義希望通過教育來塑造怎樣的“勞動身體”——他們最好像電腦一樣能夠長時間工作,靈活勝任各種工作之餘又不會獨立思考,以免威脅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當阿髮成功“物化”為電腦後,她和機器的差別又在哪裏?潘國靈意欲揭示的是,資本主義對“勞動身體”的塑造,不啻是一種把活生生的人“物化”的過程。悲哀的是,人在被塑造為“勞動身體”的同時,往往會進行“自我物化”而不自知。

回首《我城》,小說仿佛早已預告資本主義將會通過教育把“我城”人塑造成資本所需要的“勞動身體”。小說提及麥快樂和阿果在修理電話的過程中,常常發現電話綫因為銅綫外層的膠脫落而產生問題。這些外露的銅綫與其他物體接觸後,便會把別人的電話聲音傳過來。有一次,阿果在修理電話時聽到一段不明來歷的聲音,通過電話綫傳出:“現代教育的目的是把每一個人變成一部百科全書。如果你不是一個精明能幹、聰明、永遠對、機器一般準確、電腦也似的人,那麼,你到這個世界上來幹什麼呢。”⁵⁸這段說話出現於《我城》絕非偶然,它是西西對現代教育的判斷,以及未來的預測。西西曾任教師,對香港教育相當關心。《貴子弟》和《雪髮》皆是探討香港教育問題的小說。可以說,西西在寫作《我城》時,已經敏銳地留意到急速擴張的資本主義正通過教育把年輕人塑造成機器/電腦一般的“勞動身體”。到了《我城 05》面世時,西西當日在《我城》寫下的這段“來歷不明”的話,已經在 i 城得到徹底的實現。

(二) 疾病身體

資本主義把“勞動身體”區分為有用和無用兩種。前文述及資本如何通過

58 西西:《我城》(臺北:洪範書店,1999年),1版,頁186。

教育來塑造出有用的“勞動身體”，那麼無用的“勞動身體”又是什麼？哈維指出，無用的“勞動身體”便是那些不能繼續承擔可變資本的人，即那些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不能起作用，無法從事具體勞動的身體。⁵⁹ 他們可能由於生理或心理的原因成為“疾病身體”，不能勞動而被資本主義社會排拒，成為社會“之外”的人。

這類無法融入資本主義 i 城的“疾病身體”構成《我城 05》的重要面向。潘國靈《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的悠悠和謝曉虹《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的阿果，皆屬“疾病身體”。兩位作家亦通過這些“疾病身體”，批判 i 城把資本主義視為惟一發展方式的做法。

在《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中，阿果突然患上“分裂症”。患上分裂症的人會“失去工作的熱情及競爭意識”，⁶⁰阿果只好離開他一直工作的 C 區。隨著“分裂症”蔓延，i 城的領導者宣布把這群無法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裂人視為“病變的現象”、“社會沉重的負擔”、“快將被社會淘汰的人”，期待 i 城人會提出將分裂人消滅的要求。長久以來信奉人道主義的 i 城人則發出“幫助分裂人重投社會！救救分裂人！”的呼籲。⁶¹ 無論是消滅還是拯救，i 城人對“疾病身體”始終懷有否定態度，認定他們在 i 城沒有存在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謝曉虹看待“疾病身體”的態度與 i 城人截然不同。阿果雖然患上“分裂症”，丟掉在 C 區的工作，但他却是從那時開始意識到“我們必須重頭理解這裏，就像我們重頭理解我們自己一樣”。⁶² 如果不是突如其來的“分裂”，阿果們根本不會萌生重新理解 i 城和自己的念頭。謝曉虹於此顛倒了健康與疾病的相對位置，一如她的研究對象魯迅在《狂人日記》所做的那樣。⁶³ 狂人惟有在瘋狂之中，才能清醒地看透這是一個吃人的世界；阿果們惟有在分

59 David Harvey, *Space of Hope*, p. 106.

60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73。

61 同上，頁 75。

62 同上，頁 73。

63 謝曉虹曾經發表一篇題為《五四的童話觀念與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的論文，收於徐蘭君、安德魯·瓊斯（Andrew F. Jones）主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33—152。

裂之後,才有機會了解資本主義的殘酷本相。“健康的”世界不能接納狂人,要麼通過治療同化他,要麼吃掉他;“健康的”i 城不能接納分裂人,要麼通過治療拯救他們,要麼消滅他們。狂人/分裂人被視為侵擾世界/i 城健康的異物,絕不能容許他們存留。不過,《狂人日記》和《我城 05·版本零二》對未來的展望大不相同。狂人最終痊癒,“赴某地候補”,⁶⁴意謂狂人的清醒無法持續,他最終返回正常人的道路上,世界始終不變。然而,阿果們直到小說結束依然處於“分裂”當中,從未痊癒,因而保有改變 i 城的力量。

“分裂”是《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的重要主題。張歷君認為這種“分裂”展現了弗洛伊德所言“文明及其不滿”的矛盾邏輯。⁶⁵張歷君的見解固然有理,但本文嘗試說明“分裂”在《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另有所指。正如前文分析,突如其來的“分裂”構成阿果們反思現存生活的契機,亦開啓了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意義上的逃逸綫。逃逸綫——德勒茲指出,逃逸綫能夠把人帶離身處的節段,前往前所未有的目的地,一處無法預見的地方。⁶⁶逃逸綫永遠存在背叛,⁶⁷背叛“支配性指涉與現存秩序的世界”,⁶⁸雷諾·博格(Ronald Bogue)解釋,逃逸綫“是匯聚在透視圖的消失點上的綫,導向地平綫彼端”。⁶⁹分裂症把阿果帶離 C 區,讓他離開一直以來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所凝塑的人生路綫,認清資本主義的局限。對信奉資本主義的主流社會而言,阿果們無疑是脫軌分子(脫離由資本主義規定的人生軌道),但“脫離軌道即是改變軌道及創造新的軌道,出軌/調軌、取消路綫/重定路綫、誤導/導正”。⁷⁰約翰·溫斯雷德(John Winslade)指出,逃逸綫並非只是一種反抗,還是創造性的轉向

64 魯迅:《狂人日記》,載魯迅:《魯迅全集 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44。

65 張歷君:《否定的希望——〈我城 05〉初探》,頁 179。

66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John Johnston trans., “Politics,” in Gilles Deleuze and Guattari, John Johnston trans., *On the 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70—71.

67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trans., *Dialog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0.

68 Ibid, p. 41.

69 雷諾·博格著,李育霖譯:《德勒茲論文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 年),頁 261。

70 雷諾·博格著,李育霖譯:《德勒茲論文學》,頁 262。

(creative shifts), 它為人生帶來新的可能性。⁷¹ 背叛主流意識形態的阿果們沿逃逸綫離開 C 區一段日子後, 在一家“Fruit Café 果之店”工作, 轉向另外的人生。⁷²

如果“分裂”對 i 城人而言打開了逃逸綫的話, 那麼“分裂”對 i 城而言又意味着什麼呢? 對深信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 i 城人而言, “分裂人”只會削弱 i 城的競爭力, 構成城市的負擔。可是, 這些懷疑 i 城是否應該持續發展資本主義的“分裂人”, 對 i 城而言未嘗不是逃逸綫的所在: “專家承認, 對於突然出現的分裂人, 科學對他們的理解, 只在一個初步摸索的階段。就像黑暗中的一道門, 他們甚至不能確定它的位置, 更不可能知道, 它對 i 城的未來意味什麼。”⁷³ 縱使“分裂人”對 i 城而言是“黑暗中的一道門”; 門後風景如何, 或光明或昏暗, 亦無人得知, “分裂人”終究創造了一道通往創造性轉向的門。

不能忽略的是, “分裂”雖然突然發生, 却非原因不明。阿果們隱約記得, 自從城市換上新的領導者, 兩面火紅色旗幟升起的那天, “正是他們分裂的時候”。⁷⁴ 《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除了“7 月 1 日”外,⁷⁵ 通篇沒有明確的時間標記, 而這段帶有明確時間提示的情節則令讀者倍加關注。情節指向香港主權移交的那個 7 月 1 日 (1997 年)——香港的領導者從英國政府指派的港督, 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委任的特首; 兩面火紅色旗幟, 一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另一面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在香港回歸之際, 維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香港社會實則隱含“分裂”的面向——這是對繼續以發達資本主義為追求的社會發展道路的一次“分裂”。謝曉虹認為, 現有的城市發展路向對生活在 i 城的人來說, 只會把人鑲嵌在僵化的人生路綫上, 令 i 城人承受沉重的壓迫感, 消解個性解放的可能。隨著香港前途問題塵埃落定, 1997 前社會擔憂的災難未

71 John Winslade, “Tracing Lines of Flight. Implications of the Work of Gilles Deleuze for Narrative Practice,” *Family Process* 48.3 (2009): p. 338.

72 《i-城志》編輯小組: 《i 城志》, 頁 87。

73 同上, 頁 72。

74 同上, 頁 79。

75 小說有兩處明確提及 7 月 1 日, 分別是阿果記下自己在 M 區的家沒有碰上秀秀和阿髮 (頁 71), 以及小說結尾部分輯錄的阿果、阿髮等人物的網誌文章 (頁 101)。

有降臨,“第四代香港人”日漸長成,⁷⁶謝曉虹顯然期待香港能夠孕育一條超越發達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應該怎麼走?《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未有明確敘述,但肯定是一條能夠容許“分裂人”阿果們、尋求個性解放的阿髮覓得生存位置的道路。

“疾病身體”向來是潘國靈小說關懷的對象。他的小說集《病忘書》和《傷城記》中,不少作品皆以“病”為主題。在《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病”也未有離開 i 城。喜歡寫小說的悠悠是精神病患者,需要服用抗抑鬱藥“百解憂”(Prozac)。⁷⁷筆者認為,潘國靈筆下的悠悠與《我城》的悠悠有內在聯繫——悠悠在西西筆下喜歡繪畫,“高興怎麼畫就怎麼畫”;⁷⁸悠悠在潘國靈筆下,則醉心於寫作“悠悠的城”系列小說。⁷⁹無論是西西還是潘國靈,悠悠都被設定成充滿想象力、喜歡藝術的角色。潘國靈與西西不同的是,西西通過健康的悠悠表達了藝術是“自由”的看法,潘國靈則藉患有精神病的悠悠,強調藝術對 i 城這個“正常”資本主義城市的批判性力量。

《我城 05 之版本零一》在不同位置插入了悠悠寫的四篇小說。⁸⁰這些小說在健康的阿果看來只是毫不連貫的斷片,但在悠悠看來,這些斷片不單是她內心世界的反映,⁸¹更是“一個關於我成長的城市小說”。⁸²當中兩篇,更包含了潘國靈對資本主義 i 城的批判。

《悠悠的“浮沉之城”》繼承了西西在《浮城誌異》中以“浮城”來喻況香港的寫法,配上了瑪格列特的畫作《無形的世界》(the invisible world)。《浮城誌異》中的“浮城”懸在半空,暗示香港前途未明。然而,悠悠筆下的“浮城”不斷

76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把香港世代劃分為四。第一代香港人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第二代則是戰後嬰兒潮世代;第三代則是 1966—1975 年間誕生的一代;第四代則是 1976—1990 年間出生的一代,亦即謝曉虹的那一代人。詳見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年),1 版。

77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55。

78 西西:《我城》,頁 21。

79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62。

80 這四篇小說分別是《悠悠的“浮沉之城”》、《悠悠的“眼睛之城”》、《悠悠的“烏鴉之城”》和《悠悠的“口罩之城”》。

81 《i-城志》編輯小組:《i 城志》,頁 55。

82 同上,頁 31。

往下沉,甚至有一天可能終會著陸,即使“浮城”人以意志和信心來承托它,也難以永續“浮城”奇迹。與悠悠小說相配的《無形的世界》中,巨石停在室內地板上,巨石頂上的城堡已然消失,呼應小說所言:“或者終有一日,浮城從半空中掉下來,由比利牛斯山脈的城堡,變成看不見的城市。”“浮城”下沉無疑反映了潘國靈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然而,筆者認為這種悲觀源自後九七時期,中國大陸讓香港延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潘國靈憂慮的不是這種生活方式行將被社會主義取代,而是這種“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在香港終會遇上無可克服的瓶頸,達到自身的臨界點,最後引致城市的消亡。

《悠悠的“眼睛之城”》把i城描述為“一座最自由的環形監獄”。小說提到公司開除了一位雇員,原因在於他的電郵戶口被公司在一個月內截下八十個與工作無關的電郵;公司的監控攝像頭更偷偷拍下他上班時經常打盹的錄像。i城不僅要求人成為有用的“勞動身體”,更通過各式監控手段,要求人成為片刻都不能懈怠的“勞動身體”。值得深思的是,小說把那位被開除的雇員描述為《摩登時代》中的查理·卓別林。⁸³ 衆所周知,《摩登時代》是一齣諷刺資本家剝削工人的電影,映現查理·卓別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潘國靈刻意把雇員與《摩登時代》中的查理·卓別林相提並論,顯然是要告訴讀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隱含的殘忍力量,至今從未變改。

香港社會在1997年前夕,一直懼怕失去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然而,當香港在後九七時期持續發展資本主義,香港人是否就能安枕無憂? 伯特·帕克(Robert Park)指出,城市是人創造和生活其中的世界,而居民往往沒有明確意識到改造城市的同時也是在改造自己。⁸⁴ 易言之,當資本按照自己的邏輯對城市空間進行改造,改造也會同步發生在寓居其中的身體空間上。在《我城 05》中,潘國靈和謝曉虹敏銳地感受到資本主義在城市和身體空間上投下的塑形之火。城市空間越配合資本的邏輯,個體生命受到的壓迫則越大。另一方面,當資本按照其需要來塑造身體時,更把身體區分為有用的“勞動身體”和無用

83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41。

84 Robert Ezra Park (Ralph H. Turner, ed.),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 3.

的“疾病身體”。前者的自由和個性發展空間被大大消滅，後者則被視為社會的負擔，沒有存在價值。可是，對潘國靈和謝曉虹而言，被資本主義歸類為無用的“疾病身體”，正是對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反思性/批判性力量的來源。

四、“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Marxism and Literature*)中論及，每一個時代的人皆有其獨特的社會經驗與社會關係，他們共同感受到的情緒與經驗，將會凝結在一代人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中，並可以通過該時代的文學作品找到踪迹。威廉斯使用“情感”一詞，是為了強調它關切行動者主動感受到的意義與價值，涉及人的衝動、抑制與精神狀態等個性氣質。這些“情感”並不與思想觀念相對立，它們是作為感受的思想觀念，與作為思想觀念的感受。至於“結構”一詞，威廉斯表明這些情緒與經驗在容許個別經驗差異的同時，會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穩固而明確的模樣，以及深層的共同性。⁸⁵ 因為生命步調的改變，是一種可以從文學作品直接意識到的經驗。⁸⁶ 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在闡釋“情感結構”時，認為威廉斯相信整體生活中的一般組織(general organization)，只有經由真正的生活經驗，通過“情感結構”始能把握，而“情感結構”亦非單純自主心靈的產物，而是產生自社會及歷史脈絡對個人經驗的衝擊。⁸⁷ 由此可見，當威廉斯使用“情感結構”來探討某個時期的整體文化時，他非常關注社會文化、歷史與個人成長、心靈意識之間的互動。

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表示，前代人可以把社會性格或文化模式傳給新一代，但新一代在繼承這一切的同時，也會以不同的方式

85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28—135.

86 Williams, R.,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Verso, 1980), p. 27.

87 Allan Pred,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3.1 (1983): pp. 55—56.

來感受整個生活,以創造性的反應來塑造出一種新的“情感結構”。⁸⁸ 易言之,隨着時代變遷,“情感結構”也會隨之改變,因此它是“溶解流動中的社會經驗”。⁸⁹ 香港經歷 1997 年主權移交,以及資本在後九七時期持續塑造香港的都市空間,對城市景觀不斷進行“建設性摧毀”(市區重建);⁹⁰ 人口增長的同時,城市空間亦經歷“士紳化”(gentrification),重建區域的房地產價格和租金不斷躍升。⁹¹ 香港人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面前,要麼被塑造成有用的“勞動身體”,要麼被置於無用之列。這些重大變化無疑衝擊了新一代的生活與感受,在後九七時空形成屬於他們的“情感結構”。

潘國靈(1969—)和謝曉虹(1977—)同屬香港主權移交後漸受文壇注意的小說作家;⁹² 與他們同時期進入香港文壇視野的還有韓麗珠(1978—)、⁹³ 可洛(1979—)、⁹⁴ 李維怡(1975—)等青年作家。⁹⁵ 這群作家之間的年齡差距

88 Williams, R.,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63—65.

89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 p. 133.

90 戴維·哈維(David Harvey)著,葉齊茂,倪曉暉譯:《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17。

91 郭恩慈:《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頁174—176。

92 潘國靈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系,後來取得科技大學電腦哲學碩士兼人文學文學碩士。碩士畢業後,潘國靈曾肄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現代語言及跨文化研究系(後改為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他的第一篇發表在文學雜誌的小說名為《我到底失去了什麼》,初刊於《香港文學》1997年3月號,第147期。他的第一本小說集《傷城記》出版於1998年。謝曉虹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第一篇發表在文學雜誌的小說名為《維納斯》,刊於《香港文學》1999年4月號,第172期。她的第一本小說集《好黑》出版於2003年。

93 韓麗珠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翻譯系,後於香港嶺南大學取得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碩士。韓麗珠在中學三年級開始投稿,最早的散文創作於1992年12月24日(《白色聖誕夜》)發表於關夢南主編的《星島日報·文藝氣象》上。不過,韓麗珠受文壇注意,還得等到她在1998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輸水管森林》。

94 可洛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在1998年獲得第24屆青年文學獎戲劇初級組冠軍,作品名為《教育狂想曲》,這也是他第一篇發表的文學作品。第一本小說集《繪逃師》出版於2005年。

95 李維怡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系,後又同校主修人類學,獲社會科學哲學碩士。主要在香港從事紀錄片創作、錄像藝術教育、市民規劃運動,現為影像藝術團體“影行者”的藝術總監。她在2000年獲得第十四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首獎,第一本小說集《行路難》出版於2006年。

雖然可達 10 年,但他們却有類似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他們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並於本地大學完成本科或碩士學位課程,亦曾在大學修讀語言、文學、文化等專業,於後九七時期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他們在童年或青少年時經歷了 1980 年代、1990 年代香港經濟和城市化急速發展的時期,見證了香港主權移交前夕的社會焦慮。這批作家的創作風格雖然多元,但他們長年在香港生活,自覺地書寫香港的取向則無二致——他們關心資本如何不停形塑香港的城市及身體空間,關注後九七香港城市面貌的變改。這幾位青年作家,可說是擁有相類社會經驗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本文認為,分析這批“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應能發現屬於這個文學世代的“情感結構”。

哈維指出,資本積累本身具有活動上的擴張性,成長(growth)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好事。⁹⁶對資本成長的追逐,構成後九七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然而,《我城 05》非但沒有服膺於主流意識形態,還表達了對資本無限積累,把城市空間塑造為適合資本集中和高速流通的城市之深切憂慮,亦批判了資本形塑身體空間的壓迫性方式。當資本在城市空間不斷擴張,自然環境和城市居民感受到的壓力越發沉重。“士紳化”造成房地產價格和市區租金飆升,城市化則令鄉郊地區不斷消失。謝曉虹後來在收入《雙城辭典》的《吞吐》(2010)中,⁹⁷直言“城市只是像怪物那樣一直在膨脹”。⁹⁸潘國靈在《2047 浮城新人種》(2007)沿用西西以“浮城”隱喻香港的想象軌迹,以諷刺的筆觸寫道:

浮城地面上,再沒有什麼地方是未經開發的了。寸草不生,不要緊,這個世界有人造草。花不夠香,不要緊,這個世界有人造花香。天空是混濁了一點,但人們並不介意,因為天空早被摩天大樓、高架天橋、高聳入雲

⁹⁶ 大衛·哈維著,王志弘譯:《新自由主義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頁90。

⁹⁷ 《吞吐》首次發表於《字花》,2010年第26期(2010年7—8月),頁74—77。《雙城辭典》則在2012年出版。

⁹⁸ 謝曉虹:《雙城辭典(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9。

的尖塔遮擋了。⁹⁹

衆所周知,2047年乃是香港主權移交50周年之際。不過,“一國兩制”並非作家關注的焦點;“浮城”的全面都市化反而是潘國靈擔憂的所在。當“浮城”的城市發展來到極致之時,連自然環境(即使是天空)也會被排拒在人工建設之外。“浮城”中人,爲了成爲更優秀的“勞動身體”,則“一天到晚以隱形眼鏡撐大雙眼工作,到該睡眠時就進入睡眠機”。¹⁰⁰通過睡眠機壓縮人的睡眠周期,“浮城”人能夠把更多時間投入資本主義生產當中。

從這些文學想象可見,潘、謝二人並不認可香港繼續遵從資本主義路線來塑造城市空間,組織香港人的生活方式。綜觀與這兩位作家成長經歷接近的其他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不難發現迴盪其中的共同聲音——抗拒資本在城市空間的無止境擴張。可洛在《鯨魚之城》(2009)中,以《我城》的小說人物重述了一個21世紀的“我城”故事。《鯨魚之城》提到中環海邊的老舊碼頭將會被清拆,然後重建成金光閃閃的馬路和商廈;商廈底層則用於興建商場。¹⁰¹這種把城市中心地段(中環)由公共空間(老舊碼頭)重建成商業空間的發展模式,正正是資本操控城市空間運用的具體表現。“商場”在《鯨魚之城》不單是反覆出現的意象,更被可洛視爲“我城”的未來。小說有一處提及政府定下了“全城商場化發展藍圖”,決意在2020年前把“我城”發展成一個“前所未有的超巨大商場”。通過發展郊區、剷平公園和泳池,改建大學、圖書館和博物館爲商場,“我城”將會變成一座名副其實的商場之城。如果要實現藍圖,政府必須在開拓土地興建商場的同時,把現存建築悉數拆除,把舊區的人事全盤搬走。這種城市重建/改造對資本主義來說是必需的。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對剩餘價值(利潤)無休止的追逐。爲了生產剩餘價值,資本家必須生產剩餘產品。對資本主義而言,它永遠都在生產城市化所要求的剩餘產品,而這些無止境生產出來的剩餘

99 潘國靈:《2047 浮城新人種》;引用來自 <http://www.lawpun.com/?mod=iColumn&cmd=showCAS&caID=208>,最後觸接於2017年4月8日。

100 同上。

101 可洛:《鯨魚之城》(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年),頁55—56。

產品亦需要無休止的城市化來吸收它們。¹⁰² 後九七香港早已高度城市化,只有通過城市空間的“建設性摧毀”,才能持續生產/吸收剩餘價值。不過,面對“建設性摧毀”永無休止的“我城”,阿果“只看見石屎鋼筋,空氣污濁,大廈冰冷,燈飾刺眼,每秒都有永遠蓋掩不了的垃圾。”¹⁰³ 資本積累為“我城”帶來冰冷無情的鋼筋水泥森林、空氣污染和嚴重光害,為“我城”居民的生存構成極大壓力。相類的觀點在《陸行鳥森林》(2010)再次出現,主角楊天偉把香港市區的景觀概括為:“一式一樣的大廈,冰冷的商場,仿佛提醒他現實有多無情冷酷。”¹⁰⁴ 資本塑造的城市空間,從未令可洛感到滿意。

如果說可洛不滿資本主義的原因,源自“建設性摧毀”對“我城”的自然環境及居民生活構成的壓力;那麼李維怡在《聲聲慢》(2006)中對“建設性摧毀”的抗拒,則源自“士紳化”摧毀了原有社區的人情關係,令社會中的弱勢(例如長者)承受情感上極大的痛苦。《聲聲慢》寫一個發生在香港灣仔的舊區重建故事,主角小碧的家庭受市區重建影響,但身為中學生的她却在應否接受賠償遷出一事上與家人意見相左:家人認為取得賠償後可以改善居住環境,而小碧則認為遷離這個自爺爺那一代開始居住的單位,無疑等同放棄多年來建立的鄰里人情關係;小碧特別擔心住在四樓的曾婆婆(小碧自小由曾婆婆照顧,與她感情甚篤)從此會失去他們一家的照應。¹⁰⁵ 誠如董啟章對這篇小說的評論:“縱使容納了接受重建者的觀點,但作者寄託於小碧和一眾堅守家園的街坊的立場却十分清晰。”¹⁰⁶ 本文認為董啟章所言的“立場”,遠遠不止於在市區重建一事上對堅守家園者的同情,還展示了李維怡對城市空間任憑資本主義邏輯操控的憂慮。小說題目為《聲聲慢》,典出李清照詞。李清照《聲聲慢》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正好映照出受重建影響的曾婆婆,暮年之時被逼與情同親人的鄰居分離,不知安居何處的淒涼境況。

102 戴維·哈維著;葉齊茂,倪曉暉譯:《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頁5。

103 可洛:《鯨魚之城》,頁159—160。

104 可洛:《陸行鳥森林》(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年),頁274。

105 《聲聲慢》完成於2006年,後來收入2009年出版的《行路難》中。見李維怡:《行路難》(香港:Kubrick,2009年),頁243—245。

106 董啟章:《寫也難,不寫也難》,收入李維怡:《行路難》,頁13。

至於自言“我的生活就是在城市,怎樣也離不開”的韓麗珠,其創作向來對“空間”甚感興趣。¹⁰⁷誠如鍾夢婷所言,韓麗珠的小說擅寫城市空間中的各式人際關係。¹⁰⁸然而,在《外來者》(2014)中,韓麗珠把她的文學關懷擴大,呈現了一場資本在城市不斷進行空間擴張後引發的民間抵抗。小說發生在一個異常擁擠的城市,那兒只見“大廈之外是更高聳的大廈,以及巨型的屏幕”。¹⁰⁹主角平原是一位賣藥人,居住的鄉村正面對城市擴展引致的拆遷。當負責收回土地的執達吏嘗試說服堅拒遷離的平原接受補償時,平原坦言整個城市的所有地區都在發展,同意離家的人此後只能沒完沒了地展開疲於奔命的遷徙;平原認為在發展已經飽和的時候仍然要拆毀一些地方以便重建,最後只會令城市變成不適合任何人居住的地方。面對平原的抗辯,執達吏明確表示:“發展是無可避免的事。不往前走,就會落入倒退之中,最後被擠到毀滅的境地裏。”¹¹⁰這種把“發展”視為無可避免之事的論調,不是正好呼應了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嗎?韓麗珠的小說往往缺乏明確的時空標記,但這篇小說提及的“執達吏”,乃香港司法機構的成員。¹¹¹鄉郊土地不斷因為城市擴展而被收回之情節,也令人聯想到香港政府在後九七時期為了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和發展新界東北而不斷拆遷當地鄉村的做法。小說回應後九七香港社會現實的用心,躍然紙上。

《外來者》在結集發表時經過大幅度擴寫,易名為《失去洞穴》,可見作者對居所(以“洞穴”為隱喻)即將被夷平的人深表同情。不單如此,小說更批判資本積累引致的空間擴張,認為這終必招來對個體生命的吞噬:“城市的中心,早已被挖掘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巨大洞穴,洞穴被裝潢成商場或車站,人們終日流連其中,躲避烈日或風雨,而且從沒有發現,自己已被一點一點地吞噬。”¹¹²在韓

107 伍家偉主編:《寫作好年華:香港新生代作家訪談與導賞》(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頁24。

108 鍾夢婷:《“不合時宜”的小說、“不合時宜”的評論——讀韓麗珠〈失去洞穴〉》,《字花》,2015年第58期,頁134。

109 韓麗珠:《外來者》,《短篇小說》,2014年第16期,頁43。

110 韓麗珠:《外來者》,頁55—56。

111 “執達吏”負責促使人完全遵從及履行法院的判決及命令,當中包括協助有權收回土地、房產的人收回被占用的土地、房產。

112 韓麗珠:《失去洞穴》(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頁91。

麗珠眼中,鄉村的居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失去可以棲身的“洞穴”(居所),而城市居民則流連在資本建造的“巨大洞穴”中;這些“巨大洞穴”並非城市人的真正居所,它們僅是不容居留的商場和車站。爲了建造它們,城市人順應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不自覺地在資本生產及再生產過程中,消耗自身。

回顧“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面對的社會文化環境,不難理解爲何他們對資本在城市空間持續擴張一事特別敏感。自從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特區政府以“亞洲世界城市”定位香港,致力發展資本主義,維持香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政權的更迭,不單沒有妨礙資本按其運作邏輯持續塑造香港的城市空間和身體空間,反而在全球資本湧入下,運轉速度日增。伴隨日益發達的資本主義衍生的社會問題接踵而來,難以緩解。2006年,香港政府因爲填海工程而清拆擁有49年歷史的中環天星碼頭,引發一連串抗議及占領運動。運動雖然無法保留天星碼頭,却引起了社會對如何運用城市空間的關注。隨後數年,一連串以保護歷史建築以及反對現行城市發展模式爲主軸的社會運動陸續展開,無不引起香港青年作家再思持續發展資本主義是否“我城”未來的惟一可能。這些重大社會事件及城市景觀急遽變改帶來的衝擊,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個人經驗中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形塑了他們的“情感結構”。

本文以爲,“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對香港的城市想象縱有不同的個人經驗與表述方式,但這批作家因爲擁有相近的成長背景,生活在近似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其“情感結構”呈現了明確的深層共同性——那就是對資本在城市(香港)空間的無止境擴張,情感上表現出莫大的憂慮和抗拒。這批作家不約而同地批判資本主義對城市空間和身體空間造成的壓迫,抗拒“我/i城”沿著發達資本主義城市的軌迹走向未來。不單如此,他們的“情感結構”還包含了一個重要面向,那就是致力尋覓“我/i城”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替代出路。

或許只有堅持尋覓,始有尋得出路的可能。潘國靈《我城05之版本零一》把追尋出路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輩身上:小說尾聲提及阿果大學畢業後決意要踏實地生活,走入人群。¹¹³敘述者以滿懷期待的語調爲小說作結:“你們打開

113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頁62。

的一道道城市和人生交錯的門，迎向你們的，是意想不到的答案。”¹¹⁴謝曉虹《我城 05 之版本零二》則如前文所論，渴望為 i 城打開逃逸路線，期待替代出路的出現。然而，“意想不到的答案”和逃逸路線只能顯示作家對替代出路的期待，却非指向彼岸的明確路標。

《鯨魚之城》的阿果和朋友們，經歷了一場觀鯨之旅後，體認到今天的“我城”除了高樓和商場，還有極其值得珍惜的自然環境——海洋和郊野。“我城”若然要變成一座“鯨魚之城”，必須成為人與自然能夠和睦共處的城市。受資本主義支配的“我城”如何能夠做到？《鯨魚之城》寄望於“我城”居民的覺醒，寄望“我城”居民能夠培養一顆對事物（包括自然環境）欣賞的心。¹¹⁵《失去洞穴》的平原最終選擇離開逐漸被鐵絲網圍封的鄉村，但小說的另一位人物：空，則選擇一直留守。小說沒有交代空的結局，但在平原的想象中，堅持留下的空就像一顆種子，埋在荒廢而斷絕水電的房子裏，持續長出鮮嫩的綠芽。¹¹⁶這是個富有寓言意味的畫面，表現了韓麗珠對堅持抵抗資本空間擴張者的同情。這種對抵抗者的同情，同樣見於李維怡的《聲聲慢》——即使小碧無法阻止父親賣出單位，也無法阻止重建計劃的實施，但她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抵抗（單純考慮重建賠償的數目是否足夠購置新居），對弱勢者的關懷（對曾婆婆的關心），却是一道令讀者動容的反抗者身影。

雖然“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對“我/i 城”的未來路向，尚在思考與探索的階段。然而，充分意識到“我/i 城”在維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上帶來的代價，才有改變自身，尋覓“我/i 城”新路向的可能。

五、結 語

或許西西在創作《我城》時，希望以開朗活潑的方式，¹¹⁷寫下她對香港的個

114 同上，頁 63。

115 可洛：《鯨魚之城》，頁 170。

116 韓麗珠：《失去洞穴》，頁 96。

117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 2》，《素葉文學》，1983 年第 17—18 期，頁 46。

人感受。或許西西從未想到,《我城》將會成為香港文學的經典之作,啓發後來的作家反覆以“城”來想象香港,書寫香港。《我城 05》繼承了《我城》開啓的寫作道路,強調筆下之城,乃“我”(或“i”,小寫之我)之個人所居、所見、所感,所想的產物,是一座糅合現實與想象的文字城市。細讀《我城 05》,不難發現其情調與關懷,與《我城》差異甚大。不僅由於作品出自不同作家之手,更攸關兩部作品產生的歷史時空、作家個人經驗的不同。從本文出發,日後若能對西西《我城》之後的小說(例如“肥土鎮系列”),以及潘、謝二人在《我城 05》以後的作品(例如潘國靈《靜人活物》、《存在之難》,謝曉虹《雙城辭典》)繼續進行考察,比較分析他們對城市空間的思考,相信能夠對兩代作家如何想象香港,有更進一步的發現。

從《我城》到《我城 05》,香港經歷了極不平凡的 30 年,惟一不變的是,“我/i 城”一直視“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為惟一的選擇,“i 城”亦比“我城”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遠。珍妮特·吳(Janet Ng)嘗以“典範城市”(paradigm city)來形容 1997 年至 2005 年間(特別行政區首長董建華的任期),香港追求的城市認同。¹¹⁸然而,身為資本主義“典範城市”的香港,其城市空間經受資本的高度塑造後,將會呈現怎樣的模樣?資本主義怎樣塑造個人的身體空間,使其成為“典範城市”生產出來的典範身體?潘國靈、謝曉虹以作家的敏銳感受和豐沛想象力,以《我城 05》的空間書寫給出了屬於文學的答案。

《我城 05》書寫的 i 城,在資本塑造下呈現出“雙元城市”的空間特性。在 C 區與 M 區,有一道無形的界綫區隔開兩個社會階層及兩種生活方式;空間區隔同時帶來人際關係上的區隔。此外,城市空間在變為可供出售的商品投入市場,成為“i 城”人集體追逐的對象。即使原應屬於個人生活場域的“家”,亦無法阻擋消費主義滲透,被改造成消費空間。受資本高度塑造的城市空間予人的壓迫,《我城 05》有相當細膩的表現。

i 城中的身體,除了占據一定的物理空間,也是受社會文化(包括資本)所

118 Janet Ng, *Paradigm City: Space, Culture, and Capitalism in Hong Kong* (Albany: SUNY Press, 2009), p. 67.

建構的身體空間。在身體空間中，資本按其邏輯，通過學校塑造其成為能夠配合資本主義運轉的“勞動身體”。這些有用的“勞動身體”將會得到物質回報，表現出色者亦被 i 城人視為城市精英。不過，為了成為城市精英，i 城人不單需要放棄那些與生產剩餘價值無關的個性，還得自我“物化”成優秀的生產工具。當香港人以勤勉和工時極長聞名世界之際，《我城 05》則揭示資本在 i 城塑造“勞動身體”的本相。

至於因病而無法承擔可變資本的“疾病身體”，無論是精神病患者還是分裂人，皆成為被治療或消滅的對象。當 i 城亟欲將他們重新納入資本主義的正軌或者排除在外，潘國靈和謝曉虹不約而同從這些“疾病身體”發現了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性、批判性力量。

香港奉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多年，居民對資本的空間滲透和支配早已形成“慣性”，間或感到不適，却甚少意識到持續發展資本主義的代價。對香港主流社會一直引以自豪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進行反思及批判，喚起讀者對相關議題的反思，實乃《我城 05》的重要文學價值。《我城 05》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開啓了香港文學對“我/i 城”應往何處去的思考。本文認為，這種創作取向並非潘、謝二人所獨有，而是“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共同關懷。關於“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創作方向及其“情感結構”，實非現存的文學史論著給予足夠關注的議題。

香港在 1997 年前後湧現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史著作，試圖總結香港文學的諸種現象或創作成果。不論其寫作意圖如何，這些著作論述的時點，大多止於 20 世紀結束之時，未有關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以趙稀方《小說香港》（2003）和蔡益懷《想象香港的方法》（2005）為例，前者論述的時點止於黃碧雲的《失城》（1994），後者則是董啓章《V 城繁勝錄》（1999）。這批文學史著作問世後，學術界對 21 世紀以來的香港文學仍有探討，却鮮見關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從前文析論可見，當我們並置閱讀潘國靈、謝曉虹、韓麗珠、李維怡、可洛的小說，我們可以發現，當香港社會仍然抱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放之際，這一批生於斯長於斯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已經敏銳地察覺到資本在城市空間的無止境擴張，只會為“我/i 城”的環境和居民帶來

巨大的摧毀性壓力。當“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目睹“我/i城”正在為資本積累付出日益沉重的代價時,他們在小說創作中呈現出的“情感結構”,便是明確抗拒“我城”沿資本主義規定的發展道路上繼續走下去。這些青年作家以小說思考“我/i城”未來的結果如何,非本文所能預見。然而本文可以肯定,“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對“我/i城”未來的想象,終必為21世紀香港文學打開新的局面。

(作者: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

引用書目

一、中文

(一) 專書

《i-城志》編輯小組：《i-城志》。香港：香港藝術中心及 kubrick, 2005 年。

大衛·哈維著, 王志弘譯：《新自由主義的空間：邁向不均地理發展理論》。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

大衛·哈維著, 胡大平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

大衛·哈維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王志弘、王珣民合譯：《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10 年。

加斯東·巴謝拉著, 龔卓軍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可洛：《陸行鳥森林》。香港：日閱堂出版社, 2009 年。

可洛：《鯨魚之城》。香港：日閱堂出版社, 2009 年。

伍家偉主編：《寫作好年華：香港新生代作家訪談與導賞》。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2009 年。

西西：《手卷》。臺北：洪範書店, 1988 年。

西西：《我城(增訂本)》。香港：素葉出版社, 1996 年。

西西：《我城》。臺北：洪範書店, 1999 年。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07 年。

李維怡：《行路難》。香港：Kubrick, 2009 年。

郭恩慈：《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1 年。

琳達·麥道威爾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徐苔玲、王志弘合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

雷諾·博格著, 李有霖譯《德勒茲論文學》, 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潘國靈：《2047 浮城新人種》; 引用來自 <http://www.lawpun.com/?mod=iColumn&cmd=showCAS&caID=208>。

魯迅：《魯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戴維·哈維著，葉齊茂、倪曉暉譯：《叛逆的城市：從城市權利到城市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

謝曉虹：《雙城辭典(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韓麗珠：《失去洞穴》。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

羅拔·巴卡克著，張君玖、黃鵬仁譯：《消費》。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6 年。

(二) 論文

何福仁：《胡說怎麼說——與西西談她的作品及其他 2》，《素葉文學》，第 17—18 期(1983 年)，頁 46。

謝曉虹：《五四的童話觀念與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33—152。

鍾夢婷：《“不合時宜”的小說、“不合時宜”的評論——讀韓麗珠〈失去洞穴〉》，《字花》，第 58 期(2015 年)，頁 134。

韓麗珠：《外來者》，《短篇小說》，第 16 期(2014 年)，頁 43。

二、英文

(一) 專書

Andreas Hofer (ed.), *Prices and Earnings: A Comparison of Purchasing Power around the Globe*. Zurich: UBS AG, Wealth Management Research, 2006.

Burton Pike. *The Image of the City in Mod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David Harvey, *Space of H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David Harvey,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 Blackwell, 1989.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trans.), *Dialogu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 (John Johnston trans.), *On the 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Henri Lefebvre (trans., John Moo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Janet Ng, *Paradigm City: Space, Culture, and Capitalism in Hong Kong*. Albany: SUNY Press, 2009.

Jon Bird,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Jordi Borja and Manuel Castells, *Local and Global: the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Earthscan Publications, 1997.

Robert Ezra Park (ed., Ralph H. Turner),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lliams, R., *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 London: Verso, 1980.

Williams, R.,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二) 論文

Allan Pred, "Structuration and Place On the Becoming of Sense of Place and Structure of Feeling,"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13.1 (1983): pp. 55—56.

John Winslade, "Tracing Lines of Flight. Implications of the Work of Gilles Deleuze for Narrative Practice," *Family Process* 48.3 (2009): p. 338.

City-space and Body-space in *My City 05* and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 of “Post-1997 Young Hong Kong Writers”

CHAU Man Lut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rty years after Xi Xi published her novel *My City*, Lawrence Pun Kwok-ling and Dorothy Tse Hiu-hung collaboratively wrote a story about the “i-city” and published it as a book entitled *My City 05*. Through their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ghly capitalistic city life of Hong Kong, the “i-city” reveals the authors’ thoughts on the city-space and body-space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ores and analyzes how their depiction of “i-city” shows the city-space of Hong Kong as highly capitalized, so as to reveal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fact that it is not only the city-space that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of capitalism, but the body-space is also under its control. This part thus focuses on the “working body” and “disabled body” in *My City 05*. On the one hand, Pun and Tse criticize capitalism by illustrating how it objectifies the “working body” through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demonstrate how the “disabled body” engages in reflection/criticism on capitalism. The third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a comprehensive reading of “post-1997 young Hong Kong writers”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s,” that is, their resistance to the expanded influence of capitalism towards the city-space. This reading takes *My City 05* as a central text and compares it with works by

other writers such as Hon Lai-chu, Lee Wai-yi, and Ho Lok.

Keywords: Post-1997 young Hong Kong writers, city-space and body-space, capitalism, structure of feeling